

舊夢拾零

張云喬著

中國煙草博物館主辦

舊夢拾零

子題

序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5），张云乔在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和孙师毅、马季良（唐纳）合编《电通画报》。我那时和张光宇、张正宇兄弟以及丁聪等也在编绘《时代画报》。因此在时代印刷公司，经常由于业务上的接触而认识了他。郁风此时参加上海业余剧团，在卡尔登戏院演出《武则天》话剧，张云乔是搞舞台美工设计人员之一，因此也和他认识了。后来在抗战时代，在香港、广州、桂林、重庆等地也经常和他有不断的联系。回首当年不觉已经70多个年头，我们都是已经是迈向九十岁的耄耋高龄了。

三十年代在上海，最流行的进步电影如《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夜半歌声》等等，都是张云乔搞的美工设计，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他当时先后在“电通”和“新华”两间影片公司工作。

1938年“8.13”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他离沪到了武汉，接受了当时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的建议，暂时脱离电影业，从事工商企业的嘱咐，在经济困难物资缺乏的抗战后方。先是在长沙办起中国汽车贸易公司，从香港进口汽车，自己驾驶沿着粤湘公路开回长沙，冒着敌机轰炸，在崎岖的盘山公路上往返。长沙大火之后，立足在桂林开办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制烟厂。那时正值在港的大批文化人，从日寇占领下的香港撤退到了桂林，郁风和夏衍、司徒慧敏、

蔡楚生、金钟华、金山、王莹等十余人也一起从香港乘渔船化妆成商人，历经艰险到了桂林。云乔和我们同路同行，到桂林后，郁风、蔡楚生和夏公三个人就由云乔招待，住在他在桂林的家中一机械厂的楼上。

在重庆周公和师毅经常有巨额汇款，不止一次地汇给云乔，由他转交给“凭暗号收款的人”。云乔说：“为了严守保密纪律，绝对不向收款人询问任何细节，只凭暗号即交付巨款。直到解放以后，才知道收款人是地下党员，无疑那些款项是给党的地下组织的活动经费。”

湘桂沦陷大撤退的时候，云乔在桂林的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制烟厂两间工厂，迁往贵阳，沿途损失殆尽，到贵阳后，所剩无几，继续苦心经营，从头做起，终得东山再起，再度兴旺发展。

1945年日军投降，抗战胜利，他们分派优秀人员到广州开设据点，标买了敌产的东亚第二烟厂，得到较为高级的设备和厂房。从此筑穗二厂互助经营，由香港进口卷烟盘纸及印刷品、铁罐铝盒由滇筑供应烟草，利用航空运输，业务更上一层楼。到广州解放前夕，已经成为上千职工的大型企业了。

1948年，上海接近解放，沪上几间大型烟厂（福兴、华成、大东南等）打算将国内的资金逃避到香港，并将存沪原材料南运到广州。为了急于使积压的原料赶制成品上市出售，换成现金以便逃避出境，便向广州的一中烟厂提出，愿出高价收买广州一中烟厂。但云乔和他的合伙骨干分子，在商议之下认识到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必然会扶持自己的民族企业，光明璀璨的前途就在眼前，因此便拒绝了这巨额的经济诱惑，保住了这间工厂。

在1949年10月，广州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匪军临撤退时，炸毁了广州市唯一接通南北的交通大桥（海珠桥）。位于桥堍的一中烟厂，首当其冲，厂房和仓库损毁，人员也有伤亡，损失惨重，但一中烟厂并未因此歇业，救死扶伤，修缮厂房，奋力恢复，解放后业务迅速恢复发展，直到公私合营。他把工厂合营以后所得私股定息，全部捐献给建联中学（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合办的一所中学）。

当了十几年的资本家，他始终和文艺界的朋友保持亲密联系，人闹了，脸却不变，默默地干他的事业。在旧社会商业环境之下，烟、酒、嫖、赌他毫不粘边，人们在背后估猜他可能是个地下党员，实际上他啥也不是。不嚣张，不摆阔，也不装穷。见了老朋友总是笑咪咪，谁有困难他就伸手帮助，但是他自己的困难，从未向人诉说。

据我所知，当革命取得政权以后，他的广州和贵阳的两间工厂，得到公私合营。他喘一口气，就想回到他原来的文化工作岗位上来，于是他向文化部申请归队，得到批准，被安排到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重操他60年前的旧业，担当电影美工设计师的职务。但经过历次运动之后，却脱不了他的“资产阶级”成份，虽然夏衍同志一再证明，他对革命的特殊贡献，甚至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夏公曾经向珠影厂的领导上反映了云乔的政治情况，但是1979年冬，夏公到广州，在问起云乔的情况时说：“看来珠影厂对他当时对革命所做的贡献，似乎还有点将信将疑”。夏公逝世之后，张云乔和许多文艺界老友一样，缅怀夏公一生的事迹和人格的感召，便写成一篇《忆夏公》，其中有不少是鲜为人知的事，特别是他的记忆力特好，我比他小得多，却远远不如他。

最近云乔把他过去的风风雨雨，写成一本题为《旧梦拾零》的回忆录，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历史的见证，上世纪三十年代影剧界的前辈们，大概都知道张云乔其人，但对于他后来在抗战时期所做的特殊贡献，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功绩是不该磨灭的。

黄苗子、郁风
2000年2月于北京

在桂林时，朋友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孟尝”。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性格中有喜结朋友，仗义疏财一面的缘故吧。但是，对这个雅号，我不敢认同。我倒是赞成朋友张嘉德的说法，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认为你的成功秘诀主要是能知人，信任人，而又善用人。”我觉得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经营的事业之所以能够有点成就，就是因为依靠了众多朋友的帮助，并非我天生有多大的能耐。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当然命运又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大环境、小环境加上各自的性格，构造成了人的一生，成就了许许多多或悲或喜或壮或烈的故事。如今，我已经是 94 岁的老人了，风烛残年。前面的路程屈指可数，过去岁月中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也就越来越频繁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依稀如梦。往日的老朋故友也越来越多地入梦而来，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历历在目，清晰可辨。这一切促使我提起笔来，一方面表达对故人的思念，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可以算是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把我们这代人的真实经历告诉后人。

我到了耄耋之年才动手写这本书，老眼昏花，行动唯艰，精力有限。幸亏素有积累材料的习惯。写这本自传体的书，不求哗众取宠。我写回忆录即将落成时，告诉了老友黄苗子，他为我取了一个书名，叫《旧梦拾零》，意欲反映我一生中的部分史实。一不是梦话，二不是呓语，只是一鳞半爪地将过去难忘的片段，拾起来写出一本大实话，流水账，只求真实奉献给读者诸君。

目 录

一.	引言	1
二.	我的家庭	2
三.	领悟爱与恨	5
四.	初入社会 投资失败	9
五.	挥毫《血战宝山路》大型油画	11
六.	应云卫是我的良师益友	14
七.	难忘的演出	16
八.	加入电通影业公司	19
九.	“电通”经济现危机	24
十.	鸿门宴	26
十一.	杀手锏	28
十二.	蓝苹和唐纳	30
十三.	我是《国歌》的最早听众	32
十四.	新华影业公司	34
十五.	聪慧的司徒慧敏	38
十六.	结识陶氏兄弟	39
十七.	周恩来同志的嘱托	42
十八.	创办汽车贸易公司	44
十九.	传奇的“373”轿车	48

二十.	紧急撤离长沙	50
二十一.	和夏衍同赴香港	52
二十二.	陶培唐遇险	54
二十三.	刺汪案受牵连	55
二十四.	老马识途“373”	57
二十五.	初到桂林	60
二十六.	夏公为《救亡日报》筹经费	63
二十七.	支援陶培唐	65
二十八.	三进海防市	69
二十九.	码头巧遇夏公	71
三十.	转向发展工业	73
三十一.	灰皮红心商人	74
三十二.	为《救亡日报》出力	76
三十三.	一中烟厂的诞生	78
三十四.	香港沦陷	81
三十五.	海上逃难遇日兵	82
三十六.	澳门岛上遭困	87
三十七.	夜闯伶仃洋	89
三十八.	“老将”点兵过崖门	92
三十九.	“桃源”难觅	98
四十.	儿多牵挂儿多忧	102
四十一.	劫后重逢在桂林	104
四十二.	《再会吧，香港》	109

四十三.	白色恐怖笼罩	111
四十四.	重新定位找出路	113
四十五.	烟厂惨遭火灾	115
四十六.	重整旗鼓做品牌	117
四十七.	逃离桂林路匆匆	119
四十八.	陶钜唐义薄云天	122
四十九.	雪中送炭达壻兄	123
五十.	贵阳卷烟同业公会	126
五十一.	东山再起创名牌	129
五十二.	重庆设销售点	131
五十三.	对内减产 对外促销	134
五十四.	玉屏镇巧遇马伯荣	137
五十五.	挥泪安葬陶钜唐	139
五十六.	上海之行	141
五十七.	接师毅返贵阳	143
五十八.	云贵续姻缘	146
五十九.	保卫烟厂 迎接解放	148
六十.	反封锁 反禁运	152
六十一.	百口莫辩 被冤无奈	154
六十二.	师毅! 总理在找你	157
六十三.	心如止水 笑对逆境	161
六十四.	相依相伴 苦中寻乐	165
六十五.	退休转为离休	167

六十六. 用生命重画《血战宝山路》	169
六十七. 离休之后	173
六十八. 尾声	176

编后语	178
-----------	-----

附件一：

本人的年谱	182
-------------	-----

附件二 本人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选登：

一. 患难之交	186
二. 忆夏公	194
三. 好友任光	205
四. 水彩画《凤凰山的牧童》	208
五. 油画《漓江渔鹰》	209
六. 水彩画《农家》	210

附件三 外界人士发表的文章、诗词等选登：

一. 任民的《心底无私天地宽》	211
二. 夏衍的《补遗和更正》	216
三. 郁风的信	219
四. 一个耄耋老人和一幅大型油画	221
五. 花甲年添劲 报国情更逼	224

六.	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226
七.	爱国老人张云乔——汉俳 8 首	231
八.	赞张云乔同志史画	235
九.	贺张云乔大寿	236
十.	廖沫沙给张云乔的信	237
十一.	钟琛、张志芬给张云乔的诗	238
十二.	林毅给张云乔的祝词	239
十三.	黄琮给张云乔的春联	240
十四.	刘任涛给张云乔的祝词	241
十五.	《慈溪百人》之一张云乔	242

我的家庭

1910年8月29日(农历)我出生在浙江余姚县长河镇(解放后，划为慈溪市)。长河镇位于杭州湾的沿海岸，这里是海潮涨落形成的一片滩涂沙地。只能种植棉花等的旱地农作物。当地的农民以编织草帽制品，向国外销售为副业，后来，由于产品畅销海外，外汇所得超过了农产作物的收入，因此经济比较发达。

我的祖父过世后，留下了一间米店和一间酒坊。父亲没有兴趣经营，没多久酒坊和米店就都陆续停业了。父亲改为经营“麦冬”。

麦冬是一种植物根瘤、中药材。父亲向农民收购新鲜的麦冬，经过晒制、加工，按品质分级装箱，运到宁波出口，远销到香港、新加坡等地。

祖父留下的几间平房是很破旧的危房，每逢大风大雨时，栋梁之间发出“啪啪”的爆裂声音，榫头之间出现新的裂痕。为此，我常常担心房子会突然塌下来。母亲总是安慰我说：“夜不塌屋，日不倒桥，不要怕，老天爷会保护我们家的”。

在我12岁那年(1922年)，父亲在出口麦冬上赚了钱。全家人都很高兴，我用铅笔画了一张楼房的草图给父亲看，说这是我们的新家。那年我放暑假回家时，我竟然找不到家门了，原来父亲按照我的草图，在自家果园内建了一幢两层五房和五间平房，全家人已经搬进了新屋。

我的父亲张贞明，虽然读书不多，只受过私塾教育，但他的性格活跃，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尤其酷爱音乐，吹拉弹唱无所不能。记得小时候家里挂满了胡琴、琵琶、笛、琴等以及全套锣鼓打击乐器，还有一台大喇叭的唱片留声机，家里经常聚集一批客人，吹吹唱唱，热

闹非凡。父亲有时还参加农民群众组织的乐队，跟着迎神赛会的队伍，步行到四乡演出，他还喜欢和戏班的演员(当时称为戏子)结交朋友。

按当时乡俗，人们视民间乐队为社会的低级阶层，但他却乐此不疲。他的小名叫“阿沙”，因此众人给他起个外号叫“沙胡乱”^①。我四、五岁时，有人指着我的背后说这是胡乱的儿子，“小胡乱”。父亲还喜欢研究照相，家里有一架木制三脚架的大型照相机，以及洗印胶片的盆盆盘盘、玻璃底片等等。如今回想起来，童年时代的生活，对我成年后所走的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来，我父亲停止经营“麦冬”，改为进出口手工编织的“草帽坯”。由菲律宾进口“金丝草”(一种椰树纤维)原材料，分发给农村的家庭妇女，手工编织成草帽坯，运到上海，出口到美国以及西欧的法、意等国，赚取外汇。这一行业繁荣了农村经济，很快地扩展到附近各县。直到解放以后，仍继续经营不衰。

父亲曾经动员本地经营草帽业的同业，集资创办一所学校(六年制完全小学)，校名是“草帽小学”。他被推举为校董，学生一千二百余人，教师十余人(全镇人口约一万余人)，至今这间学校仍然存在，改为“职业中学”。

祖父过世时，留传给我父亲几十亩租田，每年委托叔父代收租谷，但我家经营工商业，地租收入不作为生活的主要依靠，土改时被划为开明地主，我父亲没有挨过批斗。家乡的房屋和一个果园，全部作为地主产业分散给了本乡的贫下中农。对此我完全理解，没有意见。我父亲长期居住上海经营草帽进出口商业，1957年父亲住

注：①不拘小节不按礼教的人，家乡俗称“胡乱”。

在北京我的胞弟张云尧(在北京铁道部任建筑工程师)家，因病去世，享年 70 岁。

我有一大姐张彩娟，在宁波崇德女子中学毕业后，受同乡杨贤江^①兄的启发，接受了新的思想，首先将发辮剪掉，一时轰动乡间，成为新闻。当我和大姐走在街上的时候，群众围观称奇。贤江大哥还建议大姐改名为“张吾素”，即我行我素的意思。他说你们要大胆接受新事物，将来全国妇女都不留长发，和男子们一样。后来我大姐听从贤江大哥的指点来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继续读书(上海大学有校长右任，教务主任陈望道，教授夏丏尊、丰子恺等)，在上海大学读了二年，后转入复旦大学，读新闻系(系主任是谢六逸)。毕业后去法国留学，经常看到她阅读《响导》、《新青年》、《语丝》等刊物，后来才知道她当时已加入了“CY”^②组织。

大姐在法国和谷兆芬结婚，1935 年由法国回国，29 岁因病早亡。姐夫谷兆芬曾任国民党政府驻非洲马达加斯加国的领事。在全国接近解放时期经常和潘汉年同志联系。1948 年通电起义，1949 年由香港赴北京人民政府报到，见过周总理，被安排到干校学习，半年后分配到山东省任府参事，1966 年文革初期亡故。

注：①杨贤江—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骨干党员。

②CY—即中国共青团前身。

7岁那年，我到本乡马凉亭小学开蒙，一年后转到本乡基督教会开办的小学。老师徐嘉斌，虽然是一位老年的基督教徒，但思想开朗，并不按教会的教规施教。我和同学陈东(教会牧师的儿子)经家长特别安排，晚上听徐老师讲授孔子论语及孟子等古典书籍。徐老师讲解论语内容，有他独特见解，他敢于批评孔子的一些不良思想，肯定孟子的“以民为贵”。

九岁那年，父亲为了培养我的独立生活能力，把我送到学校住宿。有一晚，我尿了床。第二天，老师把我的棉褥晾到操场上，被全校同学耻笑了一番。

此后，在“五·四”运动和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21条(21条是日本人提出的对我国侵略的辱国条约)等群众运动中，徐老师带领我们参加过游行示威，群众集会。我父亲曾经被推选到抗日宣传大会演讲，按说，教会学校的规则是不能参加这些行动的。

小学四年毕业之后，我才11岁，父亲送我到宁波崇信中学高级小学住校读书。这间中学也是教会所办，校长梅立德，是美国教会(长老会)派来的。我的班主任、国文老师周天缪(浙江诸暨人)，是一位使我一生难忘的好老师。在课堂上他介绍“独秀文存”作为我们课余读物，讲解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浅论(当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他说这两者并不矛盾，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讲“民主”反“封建”的。他还讲述当时军阀混战，吴佩孚和张作霖打“奉直”战争的形势，也曾谈到张学良、郭松龄的磨擦，曹琨贿选等等军阀之间的矛盾，讲得有声有色。他对政治局势的分析和批判，使我们对政治局势关注并开始产生了兴趣，应该说他是